

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

21.1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景 池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625 字数 54,000

1976年9月第1版 1976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171·72 定价: 0.16元

毛主席语录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目 录

- 一 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1
- 二 照耀“对资改造”的灯塔14
- 三 生产领域内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27
- 四 限制“贸易自由”41
- 五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的刀光剑影55
- 六 胜利后的斗争68

一 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它的产生、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一八四〇年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古老的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当时走向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重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因循守旧，运用反动的政治权力，设关立卡，横征暴敛，限制和压抑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在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和阻碍下，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

十九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被外国侵略者攫取的各种在华特权的保护下，大批外国商品，源源运进我国各个通商口岸，渗入到我国内地和偏僻的乡村。特别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以后，更加紧了对华的掠夺。它们凭借获得的特权，在中国开设银行，建造和控制铁路交通，开办许多厂矿企业，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牟取利润。它们在扩大对华资本输出的同时，又竞相争夺中国的商品市场，大量倾销商品，肆意掠夺原料。根据海关统计，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三年我国的出口净值指数和进口净值指数，分别为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的百分之二百八十二点七和百分之四百四十六点二。到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一年间，又分别激增到百分之

五百八十二和百分之六百六十二点三。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加速了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我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与可能。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①。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不仅不想推翻中国的封建统治，而且尽一切可能保存和维护原有的封建势力，并且精心培植和豢养中国的买办阶级，使它们同帝国主义结成可靠的反动联盟，充当帝国主义侵华的反动支柱。内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动用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压迫手段，阻止中国独立，压迫和摧残脆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政府设立了一些使用部分机器或机械动力生产的近代工业。最早开办的是“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一些直接用于镇压人民革命的军事工厂。这些军事工厂由清政府直接拨款和派员控制和掌握，并且获得外国侵略者的扶持，但当时它只是封建性的军事工厂，还不成其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以后，这些军事工厂，有的“仿照商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牟取利润为主，逐步转化为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办资本主义企业。为了同一个反革命目的，清王朝营垒里的一些买办官僚，又先后用“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形式在国内开办了一些采矿、炼铁、纺织和交通运输企业。在这些企业内，无论生产和经营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591页。

管理，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企业的性质已经资本主义化了。

汹涌澎湃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使一批批由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相继倒台。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总是在哀叹旧走狗在革命洪流中沉没的同时，又积极地物色新的宠犬。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以叛卖革命、屠杀工农群众起家的独夫民贼蒋介石，成了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新的政治代表，成了受到当时帝国主义赏识的一名最为得力的忠实走狗。蒋介石上台以后，依靠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利用其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治权力，恣意搜括人民，很快集中了大量财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对国家经济实行垄断的，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资本。这个官僚资本“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日益膨胀，“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①。据统计，到全国（除台湾省外）解放前夕，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企业共有二千八百多个，它的资本总值约占旧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百分之八十。代表四大家族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范围内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发电量的百分之六十七，煤炭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三，钢铁产量的百分之九十，石油产量的百分之百，有色金属产量的百分之百，水泥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四大家族的其他反动机构，还垄断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1149页。

了全国范围内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纱锭设备的百分之三十八，织布设备的百分之六十，糖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在交通运输方面，它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百分之四十四的轮船吨位。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的利益，“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①。

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这部分企业以中、小规模居多，较大的资本集团只占少数。一般说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操纵国家经济命脉，并且不同程度地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但它们在经济上又同这些反动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其中少数较大的资本集团，大都是由地主、官僚、买办转化而来，他们和各种反动势力的联系也更多一些。

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当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刺激下，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我国最早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或七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创办的发昌机器厂和稍后设立在广东南海县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以后，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又陆续开设了一批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企业。当时，它们的经营范围，还只限于缫丝、碾米、木料加工、棉纺织、船舶修理等少数几个行业，企业的数量既少，规模也不大。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资本开设的工厂，进一步扩大到玻璃、机器装

^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4页。

配、火柴、制冰、制药、造纸、面粉等行业。不久，民族资本经营的银行也开办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①。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一年的八年内，仅上海民族资本工业企业就增加了三百七十九家，相当于一八七五至一九一三年近四十年间上海设厂总数一百五十三家的二倍半。成百上千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和银行出现于各大城市，在短期内涌现出一大批民族资本家。

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帝国主义又大规模地卷土重来。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都大大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一九一九年，在棉纺业中，外商纱厂拥有的纱锭数比战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到一九二一年，这一增加率更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六点三。这个时期的我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也比战前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一年分别增加百分之七十和百分之六十二。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重新被置于帝国主义的箝制和压迫之下，从而，结束了短暂的“兴盛”，迅速转趋衰落。特别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以后，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内外夹击之下，使它更进一步陷入了全面衰落的困境，“刚建立的工厂冒不出烟来，才开动的机器又估价待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一面采用种种办法，加强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一面不得不按捺自己“不喜欢帝国主义”的心情，更多的向外国资本乞求“施舍”或求助于官僚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590页。

资本。

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当它开始发展的时候,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空前激烈。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不仅加紧对本国劳动群众的压榨,“使群众的处境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日趋恶化”^①,激起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决心“用毫不留情的革命手段推翻资本的压迫,推翻剥削者,打破他们的反抗,用自己的鲜血开辟一条通向不容剥削者存在的新社会的道路”^②;而且对殖民地的激烈争夺,也使被压迫国家的人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尽管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很发展,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政治影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开始了猛烈的冲击,使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处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搏斗的激流之中。同时,正因为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扎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地上,决定了我国民族资本无法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羁绊,得不到独立的充分的发展,因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先天的软弱性。

以旧中国规模最大的荣家企业^③为例。从它一八九六年开始创办,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为止,在整个企业的发展过

①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7页。

②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③ 荣家企业指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家族经营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它包括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个企业系统及其附属企业。

程中，一直受到外国资本的排挤压迫。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资本加紧控制中国的棉纺织业，日本棉纱充斥中国市场，使荣家企业面临重重困难。在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荣家企业的资本家也起而响应“抵制日货”的斗争，要求“振兴实业”，“振兴国货”，“挽回纱布利权”。但是，由于旧中国的社会条件，造成了工业机体支离破碎，生产资料的生产基础十分薄弱，工业所需要的原料、设备，无不仰赖国外输入，那时的一些轻工业，实际上不过是一些依靠外国进口的加工工业。因此，荣家企业在经济上始终保持着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当时，荣家资本经营的申新纺织公司为了从美国进口一批小麦、棉花，从英国进口一批机器设备，仍然不得不走日本的门路，通过原来的老关系日商三井洋行驻沪机构从中穿针引线，斡旋成交。抗战胜利以后，我国棉纺织工业所需原料的大部分为美棉。最高的年份，申新纺织公司使用美棉占企业全年用棉量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另一个规模较大的民族工业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解放前的四十余年中，始终同英美烟草公司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英美烟草公司为了挤垮和吞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曾先后采用削价竞销、操纵舆论工具、控制收买对方工作人员或代理商号、肆意破坏对方营业信誉等卑劣伎俩，不择手段地对它排挤和打击。“南洋”资本家在外资的重重压力下，既不甘心“屈降外人”，总想“合政府及国人之力与之对抗”，但又感到和英美烟草公司“合并”前途“乐观”。这家公司的资金周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垄断资本。它曾先后从英商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美商花旗银行、荷兰安达银行等取得巨额借款和押款，甚至在抗战胜利以后，还与英美烟草公司在分配原

料和销售方面进行分赃合作。

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大部分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发展起来的。它们虽然不满足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对市场的垄断和控制，但又无力抗争。在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外国商品大量倾销的情况下，民族商业资本不可避免地会被卷进国际资本的漩涡，成为外国商品的销售商。旧上海许多百货公司、行号、商店的资本家，长时期致力于推销外国商品，并把国内大量原材料、土特产品运销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分沾外国垄断资本商业利润的余唾。例如一向以“实业救国”相标榜的上海永安公司，解放前经销的商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进口货，甚至连水果、卫生纸也都是从外国来的，成为地地道道的外货销售商。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割不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而且养成了一种崇洋迷外的卑怯心理。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从工业部门的结构上看，民族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其中又主要是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根据一九四九年统计，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总值中，消费品占百分之八十一·四，生产资料只占百分之十八·六。而在整个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中，规模较大、有一定机械动力设备的企业，所占比重很小，大约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工厂，实际上是工场手工业性质。绝大部分工厂规模狭小，经营分散，设备简陋，技术操作落后，无法独立进行完整的产品制造，而只能从事简单的加工修配业务。就上海的机器工业来说，到一九四八年，一百人以上的工厂不过十多家，其余大都是一些弄堂小厂。民族造船工业，仍然沿用笨重的手

工操作，工人劳动强度很高，少量进口或自制的机器设备，也都是些老掉了牙的破旧货。绝大多数船厂没有修船的关键设备——船坞，全市仅老公茂船厂有一座狭小的船坞，其他厂多半只有一只简陋的船排，勉强从事小型船只的维修。许多厂甚至连船排的设备也不具备，名为船厂，实际上只能做一些轮船零件的简单加工。棉纺织行业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发生较早、发展较快的行业，但设备也陈旧不堪，使用的机器不少已超过十五年或二、三十年，甚至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制造的产品。至于星罗棋布、分散经营的一些小厂，大都是受市场的某一刺激而盲目发展起来的，往往“纱厂赚钱，大家就纷纷开设小型纱厂；橡胶厂有利，新的橡胶厂即告林立”。这些小厂很多只能完成整个产品制造的一道或几道工序，全靠厂际搭配协作，生产效率很低。至于民族资本经营的商业企业，除了大城市少数资本积累与集中达到较高程度的商号以外，绝大部分也都是规模较小的企业。这些企业多半以家族或亲属为主体，雇用少量的职工和学徒，资金不多，经营方式落后。整个商业网的分布又极其混乱。无论工业和商业，企业内部的封建行会气息都很浓厚，还保存着不少陋规恶习，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不充分。

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使资本主义的投机性表现得特别突出。投机倒把，本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列宁说过：“对于投机活动，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那就不能把它和‘正当’贸易区分开来。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投机活动”^①。外国资本本身是最大的投机势力，它侵入中

^① 《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2页。

国以后，总是竭力造成市场的投机条件，使自己得以左右一切；加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和对市场的操纵，造成了旧中国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完全脱节。在这样情况下，民族资本根本无力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竞争。为了使企业的利润得到保障，民族资本家一般都不愿意把资金投入工商业的产销活动，而浮沉于投机市场。所谓“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倒把”，就是他们恪守的信条；同时，对利润的追逐，希望爬上大资本家地位的利欲冲动，也驱使民族资本家甘于去冒被倾覆的风险。他们凭着自己长期混迹在花花世界与各种竞争对手周旋角逐的经验，大搞囤积居奇、买空卖空、哄抬市价、弄虚作假、尔虞我诈、损人利己的投机倒把活动。其中固然也有靠着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支持提携而成为暴发户的，但因此而被掀起的投机恶浪所吞没的民族资本，则为数更多，屡见不鲜。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时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①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缺乏和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竞争的条件，经常受到对方的倾轧而使企业亏损或倒闭。他们在破产之前，只要有一线生机，就不会忘情于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他们为了继续获得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的经济利益，总是千方百计地把企业的亏损转嫁到工人身上，并且谋求数倍于此的补偿。他们或者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或者制定名目繁多的罚工扣薪规则，把本来十分微薄的工人工资借故进行七折八扣；或者大批使用女工童工，顶替成年男工，招收临时

^①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9页。

工，解雇固定工；或者用调班、停工、拖欠工资等手法，尽力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样，资本家在“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①。上面提到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劳动时间，一般每天都在十一小时以上，遇到产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工人被迫加班加点从三小时直到通宵。工人工资在企业总开支和利润额中占的比重微乎其微。例如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间，职工工资总额只占企业总开支和利润额的百分之四左右，而这个时期企业的剩余价值率却高达百分之一千以上。荣家企业在抗战期间，为了转嫁企业亏损，一面借故解雇大批固定工，一面又大量招收女工和临时工。企业中女工的比例，从原来约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迅速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左右。企业的剩余价值率也从百分之三百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一千以上。商业资本家对职工的压榨也是心狠手辣的。解放前，受雇于上海永安公司的店员，每月工资收入无法维持一家温饱，遇到通货膨胀，他们的货币工资只能顶上二十二副大饼油条。就是这样低得可怜的工资，凶狠的资本家还要从中提取所谓“小帐”，恨不得要在店员的骨头里榨出油来。许多工人、学徒为生活所迫，在规定劳动时间以外，还要无偿地为资本家从事各种杂役，承受超经济剥削。“起五更，睡半夜，两头见星星”的现象，在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也是常见的。工人们不仅在企业内部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还要受到帝国主义、反动政府、封建把头、包工老板和社会上种种黑暗势力的盘剥欺压，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34页。

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①

作为帝国主义侵华的附属物——官僚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极端反动的统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官僚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则由于它在旧中国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它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它一身而兼有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又同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愿意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又害怕工人阶级起来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两重性。因而它是可以联合而又必须同它作斗争的对象。毛主席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对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矛盾惶遽状态,作过深刻的分析:“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②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607页。

②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4页。

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①事实正是这样。在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从“五四”、“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到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群众革命运动，我国民族资产阶级都曾经寄予同情、支持，有一部分人还一度参加到革命斗争的行列；但他们又从本阶级利益出发，总想利用和控制群众革命运动，使之不超出资产阶级所能容许和规定的范围，正是鉴于民族资产阶级动摇于这两者之间的阶级特征，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孤立和集中打击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毛主席为我党确定了在一定时期内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强调能否正确地处理好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革命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这一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的原则和路线，已经一再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是十分正确的。它不仅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路明灯，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我们党有可能、有力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理论基础。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本，第602—603页。